

# 论材料与学术研究之关系

黄 勇

(四川大学 中国俗文化研究所, 四川 成都 610064)

**摘 要:**材料是学术研究之基石,各类材料都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学术研究本质上是用运研究材料缔造“海市蜃楼”的观念活动。只有以开阔的研究视野,尽可能全面地选择一切可用的材料,使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对材料进行缜密的研究,才能取得有价值的学术成果。

**关键词:**材料;学术研究;观念活动

**中图分类号:**C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785(2014)03-0126-03

材料乃学术研究之基石。所谓学术研究无非是对材料的搜集、整理、分析、综合、研究与发明,任何真正有价值的学术成果必然建立在坚实可靠的材料基础之上。因此,材料的选择,材料范围的确定,新材料的发现,对学术研究至关重要。王国维先生说:“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sup>[1]65</sup>陈寅恪先生认为:“一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求研究问题,则为此时学术之新潮流。”<sup>[2]236</sup>王、陈二公之说诚为确论。纵观中国学术发展史,新材料的发现推动乃至改变学术发展潮流的先例比比皆是:汉代孔壁藏书出,经学遂有今古文的分化;晋代汲冢古书出,三代禅让的古史观遂发生动摇;宋代金石收藏的繁荣,遂有金石学之兴起。近世以降,地不爱宝,新材料蜂拥而出,各类新学问亦随之鹊起。鸣沙石室的开启,安阳殷墟的发掘,西域、荆楚等地简帛文书的出土,遂使敦煌学、甲骨学、简帛学成为举世共知的显学。受新材料倍出的影响及西来学术观点的刺激,近世学界对材料的重视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历史学中甚至出现了史料派与史观派的异趋殊殊<sup>[3]363</sup>，“史学即史料学”的观点亦曾流行一时,傅斯年甚至把“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作为史家最重要的工作<sup>[4]350</sup>。姑且不论章太炎所谓“六经皆史”<sup>[5]1</sup>,抑或马克思所谓“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sup>[6]20</sup>的观点是否允当,泛历史学的“大史学”是否能涵摄一切人文、社会学科,仅就材料与各

种学科的关系而言,学问必自材料出,则是不刊之鸿论。

大而观之,作为学术研究基石的材料可分为三类:其一为传世文献材料。此类材料向来是学术研究最主要的材料来源,在许多研究中,它甚至是构建学术大厦的唯一基石。其二为地下发现的新材料。自现代考古学兴起以来,此类材料对学术研究之影响日隆。由于此类材料往往隐没数千年,不为历代学者所见,加之往往又是其所处时代之信物,所以一经发现即可使学者发千年不发之覆,其对学术研究之震撼力最大。其三为田野调查所得的材料。19世纪人类学等现代学科兴起以后,深入民间进行田野调查、撰写民族志,以求更为真实贴切地了解古今各种文化事项的研究方法逐渐被学者广泛采用,这种得自田野调查的材料遂在学术研究中占有了一席之地,而且其地位还有一种愈来愈重要的上升趋势。在田野调查法出现之前,从田野中获取材料也是一些学者经常采用的方法,如司马迁作为《五帝本纪》,“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广采各地长老“称黄帝、尧、舜之处”<sup>①</sup>与“古文”相印证<sup>②</sup>,就可以说是一种“田野调查”,只不过太史公的“田野调查”还只是一种简单的收集野闻逸事性质的初级工作,还没有上升为科学的方法论。

## 二

材料固然重要,然而对材料的运用才是学术研究

收稿日期:2013-10-15

作者简介:黄勇(1972—),男,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古代文学。

中最为紧要的事情。运用既有材料进行学术研究的方法中,要数王国维先生“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印证”<sup>[2]219</sup>的“二重证据法”影响最大。王国维先生说:“新出之史料,在在与旧史料相需,故古文字、古器物之学与经史之学实相表里。”<sup>[7]871</sup>“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证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sup>[8]2</sup>尽管“二重证据法”在学术界曾轰动一时,然而,近年来已有人对此种方法提出质疑<sup>[9]</sup>。近年来又有人提出以文献材料、考古材料、田野调查材料相参合的所谓“三重证据法”<sup>[10]</sup>,而且有许多学者也正在使用这种方法进行研究工作。但是,“三重证据法”却并未像当年的“二重证据法”那样,在学界引起巨大反响。两种理论的不同命运说明,对材料的盲目崇拜,对运用材料的方法的迷信,在现今学术界已经逐渐有所淡化,无论是哪种材料都有其自身的局限性。

传世文献承载的实际上只是一种历史记忆,而这种历史记忆的形成又往往为特殊的历史心性所左右<sup>[9]</sup>。那么,这种历史记忆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历史文化的本真面貌,就成为—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按照福柯的观点,“权力制造知识;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不相应地建构—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sup>[11]29</sup>。那么,作为知识载体的所谓文献材料也就无非是“权力”借助监狱、法庭、警察、军队等强力手段进行的杜撰。正是基于这一点,一部二十四史也曾被诟病为“帝王家谱”<sup>[12]17</sup>。因此,使用此类材料进行研究就更加—项必须慎之又慎的工作。

考古材料固然更真实的保存了本真的古代文化信息,但是,这种偶然发现的“样本”,在统计学意义上又具有多大的代表性,也仍然是值得细细推敲思量的。更何况许多新发现的地下材料虽然于今为古,但对它所承载的历史文化信息而言也仍然是“今”。在由古而“今”的过程中,它所承载的信息也难免被扭曲。

西人所创的田野调查法固然是一种缜密的科学研究方法,与孔子所说的“礼失求诸野”也不无相合之处。但是,自今日之“野人”求得的“礼”,是否就真的能帮助我们还原已经坠失的往古之“礼”,也仍需存疑。这种通过田野调查寻求古文化“残存”,并以之印证、复原古代历史的方法,其预设性前提是人类社会的发展如同自然界的发展—般具有连续性,且有规律可循。然而,这种看似科学的理论预设的合理性早已受到质疑。19世纪以来曾盛极—时的单线进化思想日渐遭受冷遇,

甚至被否弃,即其明证。人类社会毕竟不同于纯物质的自然界,社会发展中更多的似乎不是连续,而是断裂<sup>[13]1-19</sup>。因此,以田野调查法研究古代文化,终究不是一条坦途,在研究道路上必然有许多不可避免的陷阱。

### 三

既然各类材料均有无法克服的局限性,那么,古代文化研究岂不成了无米之炊?其实,这要看我们怎样看待这项研究。如果研究目的是要复原真实的历史,那么我想这项研究所获得的结果终归是一座空中楼阁。毕竟,时间不可能倒转,逝去的历史也不可能重现,无论我们使用多么缜密的方法,多么坚实的材料,我们还原的历史也仍然只是在观念世界中制造出的海市蜃楼。如果放弃对还原所谓“真实历史”的执著,那么,我们从各种材料中抽绎出的海市蜃楼也仍然有其价值之所在,也仍然不失为—道值得称许的学术景观。海市蜃楼虽然只—种空幻的影像,但是它毕竟有着来自大地上的真实原型。

从某种意义上讲,古代文化研究实际上就是—项观察海市蜃楼的奇妙活动,而我们观察到的海市蜃楼也不过是我们所择取的材料映射到观念的天空中形成的奇瑰影像。正因为我们永远不可能穷尽所有的材料,海市蜃楼也不可能呈现出大地上的所有景观。而且,我们择取的材料如果本身就有问题,那么海市蜃楼中呈现出的影像对大地上的真实原型的扭曲就越大。因此,如何择取材料,择取什么样的材料,对学术研究工作至关重要。值得注意的是,即使选择同样的材料,由于研究者目力与主观情志的不同,观察到的海市蜃楼也往往会呈现出不同的景观。以近年来较受关注的道教研究为例,面对大致相同的材料范围,有些学者得出了道教在历史发展中不断放弃自我,乃至不断屈服的观察<sup>[14]</sup>,有些学者却在为道教的纯正性进行着辩护<sup>[15]</sup>。由此可见,主观因素对客观研究的影响是多么难以避免,这恐怕也正是克罗齐声称“—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理由之所在。不过,只要在研究工作中理性不被情绪化的感性好恶所羁绊,那么,学术研究中表现出的主观色彩就可以看作是研究者个性的体现,这本是无可厚非的事情。

既然材料对学术研究有至关重要的影响,那么,选择材料当是进行学术研究工作的首要之务。材料的择取本是“运用之妙,存乎—心”的事情,并无什么固定不易的法则可循。考古材料和田野调查材料是可遇不可求的东西,正因为其数量少,受重视程度高,在此类材料中择取合用的材料反倒不是难事,而在浩如烟海的传世文献中选择材料却殊非易事。对古代文化研究而

言,承载着精英阶层文化观念的正统典籍的价值固然是崇高至上的,但是那些为士大夫所轻视的不预流的杂书小说的学术研究价值也同样不容忽视,毕竟此类文献中也保存着丰富的古代文化信息。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它们所保存的古代文化信息恐怕比经典更加接近原生态。其实,在现代学术肇基之初,就已有许多学者认识到了在正统典籍之外寻找材料的重要性。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梁启超就已反复强调“荒诞不可究诘”的小说的重要史料价值<sup>[12]53</sup>。近年来,葛兆光在对古代社会一般知识、思想、信仰世界的研究中,也深切意识到了拓展研究材料范围的迫切性,他说:“真正的思想,也许要说是真正在生活与社会中支配人们对宇宙的解释的那些知识与思想,它并不全在精英的经典之中。”<sup>[16]12</sup>由此可见,经典之外的文献对古代文化研究的价值之所在。其实,只有尽可能全面周备地选择一切可用的材料,使用科学的方法论对材料进行深入缜密的研究,才能通过材料在观念的天空中更“真实”地映射出寓存于“大地”之上的古代文化“景观”,缔造出亮丽的学术风景线。

注释:

① 司马迁自实地“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的记载还见《太史公自序》、《河渠书》、《齐太公世家》、《魏世家》、《孔子世家》、《伯夷列传》、《孟尝君列传》、《信陵君列传》、《春申君列传》、《屈原贾生列传》、《蒙恬列传》、《淮阴侯列传》、《樊哙滕灌列传》、《封禅书》等篇。此种采集材料的方法虽然不能等同于今日之田野调查法,但自“田野”中获取材料的做法却与田野调查法并无二致。古今论太史公遍涉江海,“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多从“壮游养气”的角度着眼,惟司马贞《史记索隐后序》谓:“太史公之书,既上序轩黄,中述战国,或得之于名山坏壁,或取之以旧俗风谣。”触及了司马迁著书的方法论问题。参阅郑之洪《史记文献研

究》,巴蜀书社,1997年,第63—65页。

参考文献:

- [1] 王国维. 王国维遗书:第5册[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 [2] 陈寅恪. 金明馆丛稿二编[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 [3] 余英时. 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M]. 北京:三联书店,2004.
- [4] 王汎森. 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 [5] 章学诚. 文史通义[M]. 北京:中华书局,1994.
- [6]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 [7] 王国维. 观堂集林[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 [8] 王国维. 古史新证[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
- [9] 王明珂. 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J]. 历史研究,2001(5):136—147.
- [10] 葛兆光. 文献、理论、研究者——关于中国宗教史的研究[J]. 中国史研究,1995(2).
- [11] [法]米歇尔·福柯. 规训与惩罚[M]. 北京:三联书店,1999.
- [12] 梁启超. 中国历史研究法[M]. 北京:中华书局,1998.
- [13] [法]米歇尔·福柯. 知识考古学[M]. 北京:三联书店,1998.
- [14] 葛兆光. 屈服史及其他:六朝隋唐道教的思想史研究[M]. 北京:三联书店,2003.
- [15] 龚鹏程. 道教的性质[J]. 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4(2):4—11.
- [16] 葛兆光. 中国思想史:第一卷[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

## On Relationships Between Materials and Academic Research

HUANG Yong

(Institute Chinese Popular Culture,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4)

**Abstract:** The academic research is based on materials which, however, have their inevitable limitations. In essence, such research is an activity concerning conception which builds the mirage with the materials for research. Only when we carry out our research with the vast horizon for research and selection materials for use as many as possible and with the scientific method can we possibly achieve the valuable academic fruits.

**Key words:** material; academic research; activity concerning conception

(责任编辑:王建平)